

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前后

秦芸



林青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任命林青为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配合和支持红军转战贵州以及在全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组织游击武装的过程中，发动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贵州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九人工委”的成立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贵州籍先进分子，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外出求学。他们通过写家信、寄书刊等方式，把先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入贵州。1929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贵州建立组织并开展活动，到20世纪30年代初，贵州各地党的地下基层组织逐渐增多。同时，林青、缪正元等一批在外省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也回到贵州，开展革命运动。

1933年冬，林青和缪正元找到毕节进步教师秦天真，并发展秦天真入党。接着，三人在毕节成立了党支部，并成立了“草原艺术研究社”，通过各种活动，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广大青年和各阶层爱国人士。

为了建立起一支党领导下的武装，林青、秦天真多次做活跃在滇黔边区的游击队领导人范建章的思想工作，并在条件成熟后发展他为中共党员，扩大了党在滇黔边区的影响。

毕节党支部进行的革命活动，积极而卓有成效，但也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毕节军阀的注意。1934年夏，林青、秦天真、缪正元被迫同“草原社”的几个骨干先后离开毕节，转移到贵阳、安顺、遵义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共产党员邓止戈、刘茂隆等先后来到贵州，与中共贵州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由于中共贵州党组织的活动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开始摆脱了分散、自发的状态，朝着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更加广泛和深入的阶段发展，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以及进步青年纷纷团结到党组织的周围。在很短的时间里，以贵阳为中心，毕节、安顺、织金、遵义、炉山等地以及贵州军阀的部队里，都有党组织或共产党员的活动。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和汇合，1934年9月，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缪正元、高言志、李余生、萧仕统、王石安、赵促成组成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又称“九人工委”。这是一个“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由党内外人士结合的革命组织”。它的任务是：寻找党的上级组织，发展革命力量，指导全省的革命运动。

“九人工委”的成员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培养进步青年，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按照分工，林青等负责联络上级党组织，邓止戈等负责兵运工作，秦天真等负责学运工作和组织群众团体。不久，共产党员刘茂隆来到贵阳，经金秋介绍，与秦天真取得联系后，在贵阳从事革命活动。他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建立“文学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在青年和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

早在贵州省工委成立前，林青、邓止戈已发展了时任黔军少将参谋长的黄大陆成为地下党员。在省工委的领导下，黄大陆积极投身兵运工作。他一面为组织搜集情报，一面在黔军第一师中团结进步军人，并安排共产党员缪正元等人进入该部电报队工作，以扩大内线。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黄大陆秘密收集情报资料交给红军，并以保存实力为理由，设法阻止该师与红军正面交锋，同时暗中收容掉队的红军战士进行妥善安置。

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夺取遵义，正在遵义隐蔽活动的林青见到了早年在上海进行革命工作时的战友吴亮平。吴亮平此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经吴亮平介绍，林青见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李维

汉代表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后增加刘茂隆），林青兼任遵义县委书记。李维汉还向林青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鼓励全体党员要在白色恐怖下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省工委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由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一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它使贵州的革命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红军一渡赤水期间，黄大陆、缪正元随黔军第一师随后进入遵义，找到了林青。林青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缪正元将电台密码抄下交林青转交红军。不久，黔军被国民党中央军借机吞并。该师调防六枝岩脚，并被改编为“中央军”一〇三师，电台重新配置新密码。黄大陆、邓止戈、缪正元等人设法搞到新的电台密码、国民党军的贵州军用地图、国民党空军飞机联络暗号以及国民党军师级以上军官通讯代号等一批重要情报资料，通过秦天真带回贵阳，转交中共中央，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并为红军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2月，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到遵义，与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秦天真接上头。潘汉年听取了省工委的工作汇报，并传达了中央要求省工委配合中央红军斗争的指示。省工委接受任务后，积极开展了工作。同月，滇军在滇黔边堵截中央红军时，范建章曾按照省工委的指示，带领游击队伏击滇军，以策应

红军突破封锁，胜利转进。

为安全护送潘汉年回上海，省工委派女共产党员、贵州妇女运动的先驱蓝运斌护送。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蓝运斌与潘汉年假扮夫妻，对外称“前往北平读书”，从贵阳经独山、柳州取道广州，最终安全到达了上海。

中共贵州省工委在全省各地持续开展革命活动

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在全省各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组织，配合和支持红军在贵州的转战。省工委将林青从遵义带回的红军战报秘密传阅，并利用妇女会刊物《惊蛰》主编了一期文章，旗帜鲜明地号召“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反对法西斯统治”。此后，省工委在人民群众中持续宣传共产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传播红军胜利的消息，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贵州各地引发了极大的反响。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十六周年，中共贵州省工委安排起草了《纪念“五四”“五卅”告同胞书》，并领导学生会和妇女会联合举行纪念会。集会当天，代表们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全省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会后，还发动了纪念“红五月”活动，各校宣传队上街演讲，激发贵阳儿女的反帝热情。

随着省工委的建立，贵阳地区的党建工作进一步壮大。1935年3月，中共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支部建立，隶属省工委领导。到1935年4月，全省已有11个县和贵阳市地区十多所学校建立了县委、支部或小组，形成以省工委为核心的党的体系，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贵州省工委成立后，迅速建立了以林青为首的军事小组，由秦天真具体负责，深入各地发动武装斗争，并派军事小组成员丁沛生打入国民党部队进行策反起义工作。丁沛生在驻安顺的国民党部队中成功策动两个排起义，并在安顺、贞丰一带打游击，后编入中共黔西游击队。

在黔军军阀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之际，国民党“中央军”不仅不予配合，反而借“追击红军”之名派大批军队进入贵州，趁机夺取了黔军军阀的军政大权。随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人到贵州组建特务室，专门负责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数月后，中共贵州省工委及所属贵阳部分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林青等人先后被捕。贵州省工委一面布置营救林青，一面迅速遣散已暴露的同志。9月11日，林青在贵阳英勇就义。

林青牺牲后，贵州省工委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学习林青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和英勇牺牲的高贵气节，以争取新形势下的新胜利来纪念林青。在严峻的形势下，省工委决定整顿团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隐蔽、转移、分散活动，并在边远农村和黔军部队、绿林武装中继续开展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上级指示，组成新的中共贵州省工委，邓止戈任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策为委员，担负起领导和发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随后，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作者为北京市文史研究者）

陈维稷发起成立“小纺协”

徐涛



陈维稷早年赴欧洲留学，学习当时最先进的印染技术，1929年回国后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讲授工业化学、染色学等课程。九一八事变后，陈维稷毅然投身到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之中，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各界抗日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编写了《日本侵华年表》《日机疯狂轰炸在中国》等英文小册子，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

1938年3月，陈维稷应新四军军部的邀请，向当地军民作抗日救亡报告，不久，担任安徽省青阳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的帮助下，大批进步青年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春，经中共皖南特委批准，陈维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同年秋，陈维稷赴重庆工作，先后在重庆合作事业管理局合作物品供销处任协理和重庆民治毛纺织厂总工程师等职。其间，他接受中共党组织指示，进行了大量统战工作，并赴豫东对伪军进行策反。

抗战胜利后，陈维稷任上海第一印染厂厂长、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工程师，后受聘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和印染学教授。在此期间，他接受党组织的任务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为了团结上海纺织界

广大技职人员，1947年陈维稷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纺织事业协进会”，它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简称“小纺协”，陈维稷是主要负责人。他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争取上层友好人士，掩护在沪工作的中共党员，为中共党组织和解放军搜集、传递情报，并为人民军队采购军需物品。

陈维稷多次以聚餐为名，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中共党组织的指示。1948年，陈维稷冒着极大风险，组织工人和学生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上海爱国学生在交通大学体育馆集会，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陈维稷与史良、陈叔通等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在会上支持爱国学生的立场。在上海解放前夕，陈维稷领导“小纺协”团结了大批厂长、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推动他们向中共党组织靠拢。为迎接解放，陈维稷还和“小纺协”积极参与组织了工人的护厂斗争。

1948年12月，陈维稷不幸被捕，在党组织和上海交通大学同学会等积极营救下获释，不久被护送到解放区。上海解放后，陈维稷随解放军南下，参加了对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接管工作，并任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顾问。1949年11月，陈维稷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任副部长。

新四军第四支队夜袭运漕镇

吕勃东



1938年秋，新四军第四支队奉命东进抗日，挺进到安徽含山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第四支队领导了解到：日军为确保长江航运和淮南铁路含山段的畅通，在含山县运漕镇设立了据点，并筑有坚固工事，派伪军3个中队在此驻扎，成为新四军沿江开展活动的一个障碍。

针对敌情和地形情况，四支队首长经研究决定：立即拔掉运漕镇据点，具体由九团二营4个连队组成战斗部队，实施此次作战。按照计划，战斗打响后，由5连抽出1个班，向运漕对岸发起佯攻；大部队分为两路：第一路第二营经头家桥、陆家和方家桥过渡进抵周巷，再分两路，其五连经三台阁向东街口前进，以半个班在方家警戒，二连、六连则进占王家庄之线，派1个排在龙家湾对黄家墩据点的敌人实施警戒；第二路以一连经叶家坝、张家墩、赵家墩从马家渡河沿堤埂西上，在后叶家渡展开，同时派出半个班在韩巷警戒。

1938年10月中旬的一天，九团二营4个连秘密进抵预定位置。天黑后，四连、六连发现：敌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有两个伪军中队150余人开进了运漕镇，于是立即将此情报向指挥员做了报告。指挥员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认为：运漕镇

伪军虽然增加了兵力，但从其行动判断，属于换防，并不是针对新四军的此次行动，因此命令攻击部队仍按原计划实施进攻。

凌晨4时，战斗打响。新四军由熟悉地形的群众带路，直冲北街伪军司令部，伪军各处哨兵还未反应过来就被毙毙，战士们随即用手榴弹将伪军司令部炸毁，并乘势冲入营房。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中，营房里面1个中队的伪军被完全缴械。与此同时，四连向东街前进，攻击敌碉堡；六连直奔西街袭击伪军大队部，和守卫大队部的伪军展开激战。20分钟后，五连赶来与六连会合，共同将伪大队部守敌歼灭。不久，冲进西街的各连，也攻克了西街敌碉堡。镇内各处残存的伪军见形势不利，纷纷被歼，顿时乱了阵脚，纷纷躲避、潜逃。新四军各部经严密搜索，搜获逃敌70余人，另有一股伪军刚刚逃出镇外，就被埋伏的警戒排活捉。

经过一个半小时激战，新四军全歼运漕镇守敌，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此时天色未明，新四军参战各部一面打扫战场，一面在运漕镇就地休息。此役，四支队全歼伪军5个中队（其中生擒16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支及大批军需品，解救被伪军关押的群众140多人，新四军参战部队无一伤亡。

义勇军关门山、黄花甸子连战连捷

刘思琪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地区先后涌现出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多支抗日义勇军。由于岫岩县地处南满铁路以东、安奉铁路以南，丹东至大连海岸线以西三角形地带的中心，且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有利于开展敌后游击战，所以很多义勇军选择以岫岩山区为根据地，向周边各县的日伪军展开攻击，并干扰日军的交通运输线，一度形成了以岫岩为中心的辽宁东南部“三角抗区”。到1932年11月，“三角抗区”的义勇军合计已达3万余人，给日伪的统治以巨大的威胁。敌人深感不安，于是调集重兵对“三角抗区”进行“讨伐”。

1932年12月15日，日伪军数百人到达岫岩城北黄花甸子和关门山一带。为打击来犯之敌，义勇军各部派出2000余人，在上述地区构筑工事、挖掘战壕，进行了周密的布阵设防，并在关门山龙门设立了指挥部。

16日，日伪军一部向关门山方向进犯，遭到义勇军的猛烈打击。义勇军对走在前面的伪军和走在后面的日军进行了分割包围，并集中力量攻击伪军。数百伪军抵抗不住，很快就缴械投降。日军见状，裹挟着少数伪军退入一条沟内继续顽抗。义勇军以优势兵力把敌人包围起来。黄昏时分，义勇军在援军赶到后发动夜袭，战至午夜，

被围日伪军大部分被歼，少部分突围逃向黄花甸子。

17日，义勇军得知部分伪军和30余辆辎重大车窜到黄花甸子救援日军，便出动主力向黄花甸子发起进攻。日伪军很快溃散。义勇军遂占领黄花甸子，缴获了敌人丢弃的大车。

义勇军各部经过研究，一致认为敌人会赶来“报复”，于是将部队埋伏在黄花甸子附近高地严阵以待。当天晚8时，日军一个中队率先赶到黄花甸子。日军头目见黄花甸子“防御松懈”，于是纵马率队发起偷袭，结果却被埋伏的义勇军一枪毙命。其余日军因指挥官被打死，不敢贸然前进，于是退到矿洞沟高地，和后面的伪警察大队会合，准备天明后再行进攻。18日清晨，义勇军悄悄包围高地，并发起突然攻击。日伪军仓皇迎战，被击毙多人。义勇军又出动大刀队200余人乘胜冲入敌人驻地，经过激烈厮杀，消灭日伪军100多人，活捉伪警察大队大队长及日军参谋官以下数十人。直到12月19日，日军出动大批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赶到黄花甸子增援，才把残存的日伪军赶走。

关门山、黄花甸子战斗，义勇军连战连捷，毙伤日伪军190余人，俘虏600余人，缴获步枪500余支、机枪3挺、火炮2门、电台1部及一批弹药和军需品，为粉碎日伪当局的“大讨伐”奠定了基础。

八路军胶东反投降战役的最后一战

贾晓明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山东的国民党投降派积极响应，胶东的国民党投降派也蠢蠢欲动，组成了以赵保原为首的“抗八联军”，疯狂进攻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胶东国民党投降派各部中，赵保原是最大的顽固派和亲日派头子。他长期与日寇勾结，以发城为老巢，并在此屯集重兵，构筑工事，屠杀抗日群众，气焰十分嚣张。针对赵保原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示胶东区的山东纵队第五旅、第五支队开展自卫反击，保卫胶东抗日根据地，并调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许世友率清河独立团进入胶东。清河独立团到胶东后，在胶东成立了以许世友为指挥的胶东反

投降指挥部，统一指挥反投降作战。

当时，胶东地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投降派军队超过5万余人，而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仅1.6万余人。在胶东反投降指挥部的正确指挥下，1941年3月15日起，八路军各部分合牙山，重创国民党投降派部队；3月26日，第五旅及清河独立团攻克重镇郛城；4月27日，第五旅、第五支队及清河独立团在海阳县榆山会战的胜利。经过战斗，八路军胶东部队在地方武装、民兵的配合下，不仅打垮了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的联合进攻，取得俘敌8千余人、击溃万余人的光辉战绩，更开创了大片新的根据地。赵保原为挽回败局，令其部下在发城、赤山、万第固守，企图对抗八路军的进攻。

针对赵保原的部署，八路军胶东反投降指挥部迅速调集兵力，将发城、赤山之敌分割包围。

5月23日，五旅十四团和清河独

立团在不断紧缩赤山包围圈的同时，对被围敌人开展政治攻心战。敌团长在八路军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放弃赤山，逃回海阳。为牵制赵保原部署在万第的兵力，进一步孤立发城之敌，许世友派五旅十五团和第五支队一个分遣队，分别插入莱阳西部、西南部，袭击赵保原部的后方。赵保原多次调集兵力救援发城，均被八路军打援部队击溃，无奈之下，只得命令发城守敌“加修碉堡，固守阵地”。

当时，八路军胶东部队既无大炮，又缺炸药，便采取以碉堡对碉堡、分割围困的战术。夜晚，以火力封锁敌碉堡，用木箱、柳条筐装满泥土，在敌堡之间筑起一座座假泥碉堡。依托这些土碉堡，把敌人死死围困起来，同时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将传单散发到敌军内部，大标语贴在敌军碉堡前；利用“土广播”，向敌官兵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把馒头、大饼送给饥饿的敌军士兵。附近的顽军家属和俘虏，也

主动到碉堡前喊话，控诉投降派的罪行，呼唤他们弃暗投明、抗日救国。被包围后，发城守敌每晚都有人前来投诚。敌军官兵见状，将士兵五六个人拴在一起，以防再逃，结果导致被拴的士兵一起投诚。

在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下，赵保原自夸“固若金汤”的发城外圈工事被逐个攻破。7月初，五旅、五支队部队分别攻占发城外圈阵地，逐步收缩包围圈。7月26日，五旅十四团用火攻和集束手榴弹，一夜打下发城北山三层大碉堡，摧毁了发城的最后屏障。困守在发城的赵保原部，一面收缩阵地，一面伺机突围逃走。海莱边界的群众紧急动员起来，在各山头筑起简易烽火台，备下照明柴，手持土枪、长矛、大刀、木棒、铁锹、粪叉，严阵以待，准备协助子弟兵截击敌人。

7月27日深夜，发城之敌开始突围。敌军官兵驱赶着拴成一串串的士兵，狼狽逃窜。群众得到消息，立即在一个个烽火台上燃起照明柴，把山川原野照得通明。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在群众的支援下奋力冲杀，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山野。逃敌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缴械投降。此役，八路军俘敌2000多人，赵保原部只有少数残敌逃回万第据点。

发城之战的胜利，为此次为期5个月的八路军山东部队反投降斗争画上了一个“完美句号”。此后，胶东抗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